

魯迅故居重遊記

文化經緯

上次我去紹興參觀魯迅紀念館還是二十多年前。隔了二十載光陰，我變了，紹興變了，魯迅故居景區更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坐動車到達新建的紹興北站是上午十點半，又坐新近開通的高速公路BRT-1號線進城。二、三十公里路一般四十分鐘就能到，但因修路有點堵，花了一小時。好在魯迅故里景區就在紹興主幹道延安路和魯迅路交界處，下車後步行不到四百米就到了。遠遠瞧見灰色花崗岩上「魯迅故里」幾個黑色行書大字，看起來像魯迅的手跡，下面是較小的「LuXunNativePlace」的對照英文翻譯，還有黑線描畫的江南民居。右側幾間門面的是遊客中心，門外的電子顯示屏鼓勵大家「憑二代身份證免費領票遊覽」。

魯迅紀念館於一九五三年成立，故居於一九八八年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二〇〇二年以來，紹興市政府規劃、投資，在原有的故居、百草園、三味書屋的基礎上增添了周氏祖居、咸亨酒店、土谷祠、長慶寺、恆濟堂等與魯迅的生平和創作相關的景點。現在，參觀整個景區憑有效證件能領取免費門票，真正起到了博物館的文化教育作用。魯迅故居景區擴建完工以來，管理制度也與時俱進。不但環境整潔，每個景點門口還都用電子顯示屏展示人流數字，科學又規範。

穿過遊客中心，遊客首先進入修復後的魯迅祖居「老台門」。這座祖屋是周家七世祖周紹鵬在清朝乾隆年間購買、改建的，坐北朝南，一共四進。東西兩側有對稱的側廂，樓房，房與屋之間都有廊廡貫通，以避日曬雨淋。兩側天井裡還點綴有假山、石池等小景。老宅粉牆黛瓦，布局工整大氣，是江南世家大族的氣象。

四進房屋第一進為「台門斗」，儀門上會懸掛藍底金字的「翰林」匾額，標誌魯迅祖父周福清在清同治年間被擢升為翰林庶吉士的榮耀。第二進是舉行重大節慶和宴客活動的德壽堂，俗稱「大堂前」。紹興人稱客廳為「堂前」，大堂前就是大客廳。兩旁柱子上有一副紅底黑字的楹聯：「品節詳明，德性堅定；事理通達，心氣和平」，曾出現在魯迅的小說《祝福》中。第三進「香火堂前」是祭祀祖先、處理喪事的所在。第四進「座樓」才是家人日常起居生活的地方，又分書房、繡房、沐浴房、閨房、廚房、藏書室、倉庫等，甚至還有個「典庫」。這是因為老台門代表周家最富裕的時期，他們除了三千多畝田地，還開設了好幾家典當行。

魯迅出生和早年生活的地方則在「新台門」。周氏因為人口繁衍，清嘉慶年間在祖居附近另買宅子，分出六房入住。原本一共六進，大小房間八十多間，加上百草園，佔地四千多平方米，規模、結構和老台門相似。魯迅的故居在新台門西側。他在這裡度過了童年、少年時光，直至一八九九年去南京求學。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一二年，魯迅從日本留學回國，在紹興任教時也住這裡。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他還曾回鄉小住。

故居原為兩進。現在前面一進已非舊貌，後面一進是五間二層的樓房。現存的兩扇黑漆石庫門是當年魯迅家出入的邊門。進門是天井，原本種了兩棵金桂，所以叫「桂花明堂」，就是《魯迅》在《朝花夕拾》中提到的、夏日乘涼時祖母給他講故事的地方。過了天井到達魯迅的臥室兼書房，聽說屋裡陳設的鐵架木床還是魯迅睡過的原物。東頭樓下的「小堂前」（小客廳），是吃飯、會客之處，後半間是魯迅母親魯瑞的臥室。西頭樓下前半間是魯迅繼祖母蔣氏的臥室。樓上東頭原是魯迅前妻朱安的臥室，不對外開放。

穿過故居西面的長弄堂，就到了廚房。這裡有過去大戶人家用的三眼大灶，八仙桌，碗櫥和其他炊具。牆上懸掛一隻很大的竹編菜罩，聽說是當年周家的「忙月」（短工）章福慶做的原物。他的兒子章運水就是魯迅在《故鄉》中描寫過的「紫色的圓臉，頭戴一頂小氈帽，頸上套一個明晃晃的銀項圈」的閩土的原型。（上）

截大狀
陸月
律人行
潘恩一看情況不妙，就在審訊前逃到法國。雖然當事人已撤訴，但厄斯金仍孤身出席陪審團為他辯護。為了消除陪審團對自己的敵意，厄斯金向他解釋自己堅持代表潘恩的原因——他只不過是在履行「的士站原則」。這個原則為什麼那麼重要？厄斯金說：「從大狀拒絕為什麼國家指控的被告人抗辯那一刻開始，自由就結束了。如果一名大狀因為自己對控罪的看法而拒絕為被告人辯護，那他就把自己當成法官了。」

最近有些學者建議廢除「的士站原則」。他們認為大狀可以藉着「例外情況」輕易規避「的士站原則」，所以這個原則已名存實亡。再者，現在大狀為沒有知名度的喜歡代表具爭議性的被告人，因此這個原則已沒有存在的意義。這項建議在法學界掀起了滔天巨浪。不少大狀認為廢除「的士站原則」如同顛覆他們的信仰，剝奪他們的驕傲。有些大狀則提醒大家審判離我們並不遠。三十年前，被控參與愛爾蘭共和軍爆炸襲擊的嫌疑人因在英國找不到辯護律師，使大狀公會不得不援引「的士站原則」。近期印度的大狀公會更要求會員拒絕代表德里公車強姦案中的嫌疑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們就算犯了滔天大罪，也跟我一樣有權得到法律援助和公平的審訊。

「的士站原則」非常可貴，它不僅保護了被告人，更維護了法治。話雖如此，還是希望大家能多截的士，少截大狀。

解救香港的八條建議

方元

流動空間

香港看上去一派繁榮景象，但「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清說：「別看香港這十年來經濟好像一直在發展，其實是在倒退。」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也說：「香港是寵壞了的孩子……照這樣下去，用不了五六年就會面目全非！」他指出，香港正經歷一種「痛苦和掙扎」。

那麼，如何把香港從痛苦和掙扎中解救出來呢？最近我在英國《金融時報》上讀到專欄作家庫柏（Simon Kuper）的一篇文章《如何解救英國》。他提出八條建議，例如承認英國是小國家，把首都遷出倫敦等。我發覺英國人的一些觀點對香港也適用。受他啟發，我也為香港提出八條建議：

- (一) 承認香港是一個小地方 其實，香港大部分人現在都已經明白，所謂

香港領導階層的精英們生活在一個氣候炎熱（加上樓群的熱島效應）、人口稠密（加上多於本地人口的遊客）、物業價格過高（加上樓市泡沫）的小島上，蝸居在為數不多的甲級寫字樓和豪宅區，空間狹小，視線受阻，遠離大自然。庫柏認為，這種狀況會令有害的群體思維在精英階層中滋生蔓延，減低他們的幸福感和判斷力，進而對整個社會造成損害。

因此，我建議政府總部、金管局和證交所遷出烏煙瘴氣的中環，離開擁擠嘈雜的港島，去人口密度低、綠化面積多的大嶼山島。那裡山青水秀，空間寬廣，視野開闊。那種令人愉快的田園環境有助於政治和經濟領袖們作出明智的決策。立法會可繼續留在港島中環，因為議員們不需要視野和判斷力。

- (三) 大力宣傳香港的負面形象 內地居民赴港旅遊使香港的經濟和就業大大受益，但也給公共設施（特別是公廁）帶來壓力



黑幫電影：把負面當作正面來宣傳（方元提供）

「大香港」只是一些人自我膨脹出來的海市蜃樓，大風一吹就飄散了。然而，一些政客和市民至今不能接受這一事實，總覺得自己的「國際地位」與中國格格不入。

我提出的解救方法簡單易行：讓他們回到中學，補一堂通識課。他們需要知道一些基本的常識和數據，例如：香港自一九九七年已是中國的一個城市（特區），人口相當於東莞或佛山，只是上海、北京人口的三分之一；土地面積約為深圳的一半，只是上海的六分之一，北京的十五分之一；香港的人均生產總值（GDP）已在二〇〇九年和二〇一一年分別被上海和北京超過。去年，在全國三十一個省市的GDP排名中，香港已滑落到中下游的第十七位，而且預計明年將再下降兩位。

當他們經過痛苦和掙扎，接受了這些事實之後，「大香港」就會從眼前消失，他們的「國際地位」也就能找到合情合理的位置了。

- (二) 把行政和金融中心遷出港島

有些政客和「港獨」組織趁機在兩地人民之間製造和挑撥矛盾。特首梁振英現在面對兩難局面：一方面，一些立法會議員不斷給政府施壓，要求限制和減少內地遊客人數；另一方面，商界反對限制，認為此舉違反自由市場原則。

倘若特首採納我的建議，那麼既可降低遊客來港的數量，又不違背自由市場原則。負面宣傳是英國政府的創意，專用它們來阻止外國移民。香港政府不妨借用此招，不要再宣傳香港人友善、守法、文明好客的形象，而改用那些辱罵遊客的「港獨」分子，挑撥兩地矛盾的政客充當香港的「形象大使」，並把他們的言行在「央視」上反覆播放，引起內地人民的反感情緒，從而減少來港旅遊的人數。

如果能把負面當作正面來宣傳，那就更好了。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今年推出的黑社會專題電影展——《江湖了斷——香港黑幫電影的類型情結》就是一個範例。它一氣推出三十部「腥風血雨」的黑幫電影，大力宣傳社會的黑暗面和「暴力

自由談
這很容易讓人想起一句俗語：「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可是古往今來，有幾個不作為的官員，會主動「回家賣紅薯」？一是他們不承認自己不作為，二是難於發現他們不作為，三是沒有具體的法律和制度，來懲治他們不作為。

按照字面的解釋，「不為」是與「有為」相對而言的。一個人擔任了一定的領導職務，就負有了實施某種職務行為的特定法律義務。該履行而且積極履行責任和義務，就是「有為」；能夠履行而不去履行，就是「不為」。權利和義務，是同一法律關係中兩個不同的側面。兩者互相依賴，又互相轉化。承擔一定的法律義務，也是擁有一定的法律義務的前提。如果只享受權力和待遇，不為老百姓辦事，這樣的官員又養之何用？

當官的最大風險之一，就是「出事」。尤其是在這一個百舸爭流的時代，人們的思維多樣化，訴求也多樣化。無論你上什麼項目，辦什麼事情，都可能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對。你滿足了一些人的要求，就會引起更多人的不滿。你照顧了這些人的利益，就傷害了那些人的利益。你去挑釁，就可能壓傷那些人的利益。你去挑釁，就可能壓傷那些人的利益。你去挑釁，就可能壓傷那些人的利益。

如何懲治「為官不為」
汪金友
為此有一些官場聰明人，便總結出一條規律。「做事」就會「出事」，「過硬」就得「過軟」。那些「出事」的人，往往不是「做事最多」的人，而是「出事最少」的人。不做事，就不會有「出事」，不會有風險，不會得罪人，不會留下把柄。所以為了「不出事」，寧願「不做事」，不求「過得硬」，只求「過得去」。

選擇性「實錄」

嚴陽

文史叢譚

後一朝代為前一朝代修史，每個朝代幾乎都有宮廷「實錄」記錄本朝發生的重大事件，是中國的一大傳統。不過，名為「實錄」的本朝歷史中，很多朝代的做法是選擇性「實錄」。而這裡所說的選擇性並非指的是去偽存真、去小留大的「選擇」，而是根據實際需要——執政者的主觀願望進行的某種選擇，是有所掩飾、迴避的選擇。

在明人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九》中，在「郊壇大風」一章裡，有這樣一段文字：「成化丙申年正月十三日，上方南郊，忽陰晦大風，郊壇燈燭俱滅，執幡應樂官俱凍死，此祝枝山祖父居京師親見，而《憲宗實錄》不載，蓋秉史筆邱文莊公諱之也。」這段文字就向我們披露了這樣一個事實：明朝成化年間的某一年，明憲宗到南郊祭祀，忽然間颶起了大風，以致燈燭一下全都熄滅了，手執幡旗進行指揮的人以及樂官全都凍死。而這一幕乃是「吳中四才子」之一的祝允明的祖父當年在京師親眼所見；然而，《憲宗實錄》卻沒有記載。為什麼？沈德符以為那是因為史官有意迴避。

事實上，在明朝，不乏跟各種祥瑞之事相關的歷史記載。比如說黃河水某年某月忽然變得澄清，又如說某年某月某位皇帝登極天降甘露瑞雪，等等。而這些拿今天的觀點來看，不過是與颶風下雨、溫度升降、天晴天陰、日食月食完全相同的自然現象，與人世間發生的這樣那樣的事八棒子打不着，但是，作為帝王之人卻喜歡大事渲染這類事。為什麼喜歡大肆渲染這類事？那是它們似乎可從一個角度證明其執法的合法性——看，這些祥瑞之兆難道還不能證明我在台上乃是「天意」嗎？還不能證明在我的治下，風調雨順，百姓幸福嗎？所以，「記下來」也就成一種必然。

至於說到皇帝到郊外祭祀，碰上大風降溫天氣，燈燭被吹滅，隨行人員被凍死純屬同樣屬於自然現象，也是偶然現象——可能是數十年一遇乃至更長時間才能一遇的罕見之事；因此，至少應該作為本朝一件大事如實記錄下來，供後人研究、解讀。但是，因為迷信、因為宿命，因為這些在很多人心目中十分「不祥」，所以，它們只能被忽略——負責「實錄」的史官端的可是人家的飯碗，自家的小命也都在人家手中捏着，有幾個敢造次的？儘管說像春秋時期的董狐那樣，敢於「秉筆直書」人，中國歷史上也有，但惜乎僅僅是個別，是例外，更多的史官還不是俯首帖耳、投其所好與唯命是從？並且，這其中還可以有一些人是屬於自覺的、主動的，因為他們的利益是與「帝王」交織在一起的。

意味深長的另一點是，中國歷史上固然有明朝成化年間明明發生了罕見的「自然災害」卻史不錄的，但也還有截然相反的例子——明明沒有發生自然災害，卻大事渲染自然災害的。為什麼要渲染？乃是為了迴避人的責任，拒絕反思、拒絕檢討，蠻橫地要求大自然為其承擔它本來不該承擔的責任；還可能是為了維護自己「英明偉大」、「一貫正確」的形象。因此，對於冠之以「實錄」之名的一類歷史，讀來之時你還真不能不小心、不能不謹慎。

美學」，令人對香港產生恐懼，減少內地人民來港消費的意欲。

(四) 把性服務和毒品銷售納入GDP統計 這是學習英國的先進經驗。這兩個行業現在仍被稱作「賣淫」和「販毒」。據倫敦政府今年的預測，納入這兩項產業可使英國的經濟規模擴大一百億英鎊，並把GDP拉高五百個百分點。

面對內地省市不斷趕超香港GDP的情況，我建議特區政府效法英國政府的作法，把性服務和毒品銷售納入統計。香港的賣淫和販毒規模大於英國，可以把GDP拉得更高，同時還可以改善產業單一的問題，從而增加香港的競爭力。而內地省市在國家現行制度下，不可能把賣淫和販毒納入GDP統計。因此香港可以重奪領先地位。

- (五) 成立立法會劇團

有些議員在立法會開會時扔公仔、戴面具、撒紙錢……花樣百出，令會議不能正常進行，甚至被迫中斷。民建聯議員李慧琼批評這些議員把立法會當作演戲的「大劇場」。

其實，這些議員不是演給李慧琼看，而是想通過電視轉播，演給市民們看。但由於本地電視節目太爛，市民們現在不看本地電視，以致白白浪費了議員的表演。所以，我建議成立一個「立法會劇團」，在「立法會足球隊」之外多提供一個表演平台，並安排那些議員去劇場巡迴演出，以便把立法會議事廳留給想做正事的人。

- (六) 學校採用普通話教學

確切地說，這條建議的原創者是前港大副校長、教育學院院長程介明教授。他在二〇〇〇年就指出：香港應以普通話教學，粵語教學是「死路一條」。但他的建議至今未能落實，因而我再提一條。

其實，很多香港人都不知道漢語的普通話和簡化字是聯合國使用的六種官方語言之一。講粵語，在中國走不出廣東省，在美國走不出唐人街。既然香港人很在意自己在中國及國際的影響力和競爭力，那就不能只講粵語，不學普通話。

- (七) 向內地出口老人

最近英國《金融時報》有一篇報道，題目就是《香港欲向內地「出口」老人》。它說：「香港政府啓動了一項把老年人送往內地的試點計劃。」所以，我的建議是「馬後炮」，唯一的作用是把政府未講出來的事實講出來。

香港有經濟學家指出，貧富懸殊和人口老化是制約香港經濟發展的兩個結構性社會問題。香港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早在一九七一年即超過了零點四的警戒線，如今已攀升到零點五三七，是發達國家和地區中貧富差距最大的地區。同時，香港貧困老人的比例也是發達國家和地區中最高的地區。因此，把貧困老人送去內地，既可減低香港人口老化率，又能降低香港的堅尼系數。

- (八) 為印尼女工造一座銅像

印尼姑娘阿維安娜(Erwiana Sulistyarningsih)在香港作家庭工人時，受到僱主的殘酷虐待。她的悲慘遭遇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因而被美國《時代周刊》選入二〇一四年全球最有影響力的百位人物。

雖然阿維安娜不是香港人，但她的國際地位是由港人一手一腳造就的。在香港，外籍家庭女工受虐待的情況相當普遍，虐待女工的僱主既有家庭主婦，也有大學教授。但是能把女工虐待成國際名人，這是第一次。香港貿易發展局和旅遊發展局每年花費巨額資金為香港提高國際知名度，但阿維安娜用一身傷疤就做到了。

我建議把阿維安娜的銅像放在皇后像廣場或維多利亞公園。那裡是外籍家庭女工周末聚集之地，便於她們每年在銅像下舉辦燭光晚會。需要說明的是，本建議與公義無關，純粹是為了給香港創造一個人文景點，以增加旅遊業的收益。

在此誠意邀請市民為解救香港獻計獻策，有磚拋磚，有玉拋玉。